

当代资本主义纵横谈

——《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一书作者李琮访谈

■ 启文 本报记者

(上接 10月12日 02版)

记:如此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与长波一样,大约都是五、六十年,而其经济运行的态势都有各为25年的快速增长期和缓慢下行期或停滞期?

李:是的。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论述,也经过了历史的验证。但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不仅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长短并不一致,而且各阶段经济态势的变化也各不相同。每个阶段都各有其特点,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会有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因素对其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首先,作为阶段性发展的主要动力的科技革命高潮的兴起,很难说正好是五、六十年就发生一次;其次,作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即源于各国统治集团进行的体制改革,也不一定会那么有力和有效;再次,经过几十年之久的世界大局与以前比,必定会有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条件必将大不相同;最后,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战争、动乱和革命,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疾病,重要资源的短缺或新资源的大量开采,等等,也都对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如果说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它们的国情不一,其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的过程更不可能整齐划一,必定有快有慢,有早有晚。此外,还必须指出,无论在长波的增长期或下降期,每十年、八年或更短的再生周期仍然存在。因此,长波与再生周期,总是互相叠加、互相交织的。这些因素都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和经济长波的表现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经济长波的规律也会存在,并在资本主义各阶段的发展中起作用。

记:您在说明长波理论时,着重提到了“大危机”这一概念,认为它在资本主义经济阶段性发展中中和长波的起伏中,起着特殊作用。请问您对“大危机”是如何定义的?它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来是与周期性危机相伴而行。每十年或七、八年一次的生产过剩危机,是为人所熟知的。这种危机是资本主义每一次再生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次周期的起点。每次危机的表现都各有特点,其严

重性和对生产力的破坏力也各不相同,有的比较轻微、缓和,有的则更为严重、深刻。

但是,在这些危机中,有的危机特别严重,但同一般且难以克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生产过剩性危机,而且有结构性危机和制度性危机互相纠结,互相交织。这些危机往往早就存在,并不断发展,但往往是潜在的,并为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当生产过剩性危机发生时,它们也就一起表面化,与生产过剩危机相互促进,从而使危机格外严重,难以克服,成为大危机。从危机的发生不仅是再生产周期中经济高涨的终结,而且是长波的增长期终结的标识。

为什么会发生制度性危机和结构性危机,其根源也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是在长波的增长期间,资本竞相追逐高额利润,而政府不仅不能进行适当调控和管理,反而对大资本集团采取鼓励和纵容的政策,以致最终造成结构失衡,体制不当。

如2008年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就属于这样的大危机。这次危机之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仅已出现某些部门生产过剩现象,如航空业、汽车制造业、电子技术产业等,而且已出现结构性 and 制度性问题,如金融业空前大膨胀,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房地产信贷泡沫形成,石油和粮食价格的加速上涨,政府财政赤字的不间断扩大和主权债务的迅速积累;对外贸易逆差的增长,居民负债消费的非理性增长,储蓄率降到零点以下,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强,失业率的上升,贫富差距的空前扩大等等。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危机爆发,所有上述这些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尤其是金融“非理性”大膨胀的问题,一齐爆发,酿成了这次大危机。

生产过剩危机的作用,是用强力破坏和清除过剩的生产力,恢复生产和市场的均衡,为新的投资和生产扫清道路。而大危机的作用则是以更强大的力量,特别是由政府这只“救火队”的手,实行挽救措施,缓和危机,进而实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然而,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十分棘手,绝非短期可以完成的。而且还有可能把危机从企业 and 市场转到政府头上,把政府拖进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之中。因此,大危

机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波的下行期。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困境中挣扎,以寻求出路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向下一个阶段摸索前行的时期。

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上,这样的大危机,已经发生过四次。第一次发生在1873年到1878年,这一次大危机加快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第二次是1929—1933年,它迫使资本主义从一般垄断转向国家垄断阶段;第三次是1967年开始发生的滞胀,以及在此期间于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爆发的两次危机,它促进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转向国际垄断;第四次,即2008—2010年发生的全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也将促进资本主义从国际垄断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变。由于这次转变是在新的更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势中进行的,它究竟将走向何处,这次阶段性转变将怎样进行,新的阶段是怎样的阶段,是值得注意跟踪考察的大课题。

【访谈第三部分】

记:您曾谈到,资本主义各阶段都有其特有的基本特征,这些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在一定阶段生产关系发生部分质变的具体体现。您的这本书系了很大篇幅,对现阶段,即国际垄断阶段的基本特征的到来去脉一一进行了论述。对此也请您予以概括性的说明。

李:我在本书一开头就强调指出以下两点。一是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表现在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局部质变上,包括各国内部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以及其对外经济关系和体制的局部质变,这一切都具体体现在各阶段基本特征的新发展、新变化上。反过来说,各阶段基本特征的形成,是该阶段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发生局部质变的基本标识。西方的学者往往抓住资本主义在某一时期出现的任何一种新变化、新现象,据以提出各种各样资本主义的“新”概念,如把当今资本主义称为“数字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利害相关的资本主义”,甚至还有“超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等,都是不恰当的 and 错误的。二是我提出,各阶段的基本特征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在前一阶段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而来的。这个演变过程,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规律,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是政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

■ 葛守昆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接 01版)

1、居民增长的消费需求因素

居民消费始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居民消费本身的增长也并非越快越好。一般来说,人类在解决温饱、生活实施初步完善以后,消费的增长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时候,主要追求消费的品质、安全、健康和等因素,消费表现出科学合理而富于理性。特别是在没有大的消费升级和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片面追求过高的消费水平,会导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并非是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不会有大的增长。

2、资源的供给因素

资源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当今世界,凡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未必就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但这并不能降低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长期发展来看,一个国家如果资源匮乏,会制约自身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它获得外部资源的能力,以及它利用资源的水平和效率。考虑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和数量。

3、环境容量因素

在现代社会,环境成为人们重要的消费元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必须在保护环境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进行权衡和选择。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消费,事实上抵销了部分的经济增长。比如由高速增长引致的空气污染、水污染等,必然会明显加大经济增长的外部成本,加重环境治理和修复的投入经费。所以,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就要认真考虑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问题。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环境容量有限的国度,更要考虑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刚性约束。

4、国际竞争力因素

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经济增长会有较大空间和回旋余地,国内外市场的利用游刃有余。通常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的时候,可以在国外市场上争取较多的份额。并且在应对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关税壁垒等方面也能保

持一定的优势。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的经济增长,除了改革驱动和投资拉动外,主要是依靠利用外资、扩大出口,以劳动力的低成本、环境准入的低门槛以及土地的低价优惠。今后一段时期,原来那种有缺陷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将不复存在,过去的国际竞争力优势经济增长的因素,必须在争取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方面有所突破。

5、科技创新因素

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在消费层面上,还是生产层面上,科技创新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理念。使用什么样的投资和设备生产,有多高的因素,产品的品种、性能如何,都跟科技创新有很大关系。并且,科技方面的创新,不可能靠单纯的引进。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资本和技术的引进,会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没有自身的创新,经济增长只能主要表现为是“懒汉式”、“寄生型”的。从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环境、创新的人才,以及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量。

6、制度因素

经济制度涉及到人的权力、利益和责任,决定人的行为,是约束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作为经济制度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能否激励人们追求利益的动力,规范经济行为,并形成有效的宏观调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如在收入的宏观分配问题上,多数基尼系数过高,财富急剧向少数人集中,多数人并没有同时分享发展的成果,同样在事实上抵销了实际的高速增长。并且,这样一种分配制度,不可能维系长期的快速增长,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三、中国需要的经济增长是什么?

综合考察上述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才能决定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什么大课题。

1、突出以消费为目的经济增长

中国是人口超级大国,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必须始终确立以消费为中心组织经济增长的理念,打破为生产而生产、为投资而投资的增长传统。将经济增长的重点放在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方面,注重消费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居民消费质量以及消费对于社会发展的进

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消费点GDP中的比重在70%左右,我国不到40%,反映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经济增长也为了投资的特征,从反面也说明消费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外,消费安全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矛盾。缺少消费安全,任何经济增长都会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前些年,从出现三聚氰胺“毒奶粉”后,不断出现“毒大米”、“毒猪肉”、“毒香肠”、苏丹红、地沟油等,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搞得人心惶惶、无所适从、无可奈何,在退回到生存上,是将人们一下子从无可奈何状态退回到生存状态。这也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敲起了警钟。

2、抛弃狭隘的速度思维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到实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来,各级政府以及许多经济学家灵根深处的思维,基本上是要以经济增长的高速来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先是提出要“超英赶美”,现在则是计算按照前些年和现在的增长速度,将在哪一年赶上和超过美国。好像有些学者整天就在做这样的事,有说2016年赶上美国的,也有说2020年赶上美国的。我当然希望中国的经济能赶上美国。但是如果脱离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不负责任地充满幻想,很可能是“黄粱美梦”。一方面,给“中国减油门”提供借口,另一方面,如果事与愿违,会打击人们的信心。其实,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是正常的,不必脱离实际可能,强行一定要赶上和超过某个国家。而且,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过去多年里的高速增长,除了高于GDP2—3倍的固定资产投资外,还包括大规模地利用外资和大规模的出口,GDP中有30%左右的外资份额。如果不是计算GDP,而是计算GNP,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剔除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顺差肯定有很大差异。我认为,考虑到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里,环境因素、技术因素,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不用说在技术上赶上美国,就是在总量上赶上美国,都是困难的事。结合今年上半年GDP7.6%的增长,我跟许多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速度不是偏低,而是仍然偏高,不排除存在过热的情形,有相当大的降幅空间。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如果能在3—5%—2—4%左右,就是理想的增长,如果降到1—2%,只要居民的消费不降低或略有提高,社会也能承受。片面追求高速增长,只会图虚名、招实祸!



3、将环境保护放在经济增长的首位

在经历了工业化中后期以后,环境在经济增长中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消费层面上,环境成为了重要的和基本的消费品。比如,对清洁空气的需求、对干净水的需求,是消费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只是钱多了、房子大了,但生活在雾霾状态,会大大降低消费的质量。必须彻底从“先上车、再买票”、“先污染、再治理”、“边治理、边污染”中摆脱出来,对现有土壤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进行认真的普查和评估,坚持严格的环境评审制度。必须根据环境容量,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宁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也要保护生态环境;宁要绿水青山,才要金山银山。对牺牲未来,以破坏损害环境为代价形成的经济增长,必须严惩重罚,决不搞下不为例。

4、促进有分配公平的经济增长

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是从结果上反映的生产关系。分配公平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公平分配条件下5%的增长,可能比不公平的10%的增长要强很多。这方面,首先要走出西方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的误区。在西方福利经济中,公平的定义是收入均等化的概念,与我们追求的公平相去甚远。我曾经提到过,平等不平均,平均不平等。分配的公平,不是收入上的无差异,也不是差异越大越好,而是将收入的无差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见葛守昆、金毅著《生产关系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我不同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应该是“公平优先、促进效率”。因为效率来自于公平,公平出效率。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些人讲蛋糕做大了,再来公平地切蛋糕,但这些年蛋糕确实大多了,可是收入分配却更不公平。这就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论者最好的回答。联系到这些年房价为什么越来越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仍然居高难下,问题的背后是收入不公平分配造成的后果。一些富人财富来得太

快,囤积了大量住房,垄断了房价,形成了大批穷人买不起房,商品房严重过剩的局面。另外,前些年财政收入超常规增长,劳动者工资所占比重偏低,也反映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况。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必须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保护劳动者合法的收入;建立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机制,在不搞平均主义、保证投资者积极性的基础上,强调高收入者多交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低收入困难群体基本的生活权利,保证基本的生活条件;切实处理好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调节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

5、建立有责任约束的经济增长机制

经济增长既要有利益激励,又要有利行为规范,二者缺一不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比谁都高,比老百姓高,比企业家高,但是面对经济增长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分配不公、环境污染、房价高涨等,却找不到真正的责任主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但表现在地方政府,往往“高速增长是硬道理”、“上项目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道理”,对资源高消耗、环境污染、投资高负债等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往往是将矛盾向后拖延,包括贷款,也是只往钱看,不负责任。说到底,缺乏完善的制度约束,没有真正形成对增长质量负责的机制,尤其是对未来负责的机制。新时期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强有力的责任约束机制,一任领导,不仅对任期内的增长速度负责,更要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有续利用、收入分配公平、偿还债务等负责,而且,还要对任期内自己行为给后人 and 未来造成的影响负责。有了这样的责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只追求高增长却不承担高增长后果的矛盾积弊,让经济增长回到合乎规律的科学轨道上来。

(完)